

階級與階層

蘇國賢

階層化與不平等

社會一定會有不平等嗎？

衝突論與功能論的觀點

階層化結構的不同面向？

不平等是甚麼因素造成的？

「分配與機會」「個人與結構」的分析

不平等的結構會改變嗎？

社會流動與不平等的再製

結論：

階層化新興議題與臺灣本土研究



教育與不平等有高度相關。

摘要

1. 階層化 (stratification) 指的是一個社會的成員，不平均地分布在與資源取得攸關的不同社會類別或地位上的情形。其主要課題，在於描述社會中各種不平等的現象，並解釋為何不平等可以持續不斷地存在。
2. 古典社會學理論指出人類社會衝突的本質，即擁有較多資源的「少數」，可藉由資源所形成的優勢力量來支配資源較少的「多數」，以維繫這種資源分配不均的狀態。
3. 結構功能學派強調不平等有助於解決現代社會分工體系中的誘因問題，對社會具有正面功能。衝突論者認為過度的不平等會產生階級間的剝削及機會阻隔，不利於社會整合。
4. 階層化同時具有主觀與客觀的面向，也可分別從個人與結構面來進行分析。「分配」不平等與「機會」不平等是兩個彼此相關、但不完全重疊的重要面向。
5. 對於貧窮的解釋很容易陷入個人歸因的誤謬。貧窮問題不能等同於所得不平的問題。所得不平等的變化是政策、人口、經濟、社會結構等結構性因素長期作用的結果。
6. 地位取得研究主要探討家庭背景與教育對於個人向上流動的影響。階級流動則分析整體社會的機會結構是否隨著工業化越來越趨於開放。兩者都與社會結構的再製力量有關。
7. 競賽流動與薦舉流動是現代社會中兩種主要的流動規範，兩種規範都可以用來合理化不平等的現象。

壹、階層化與不平等

每個社會中，都有一種按照個人出身 (ascribed) 背景或後天成就 (achieved)，將其成員區分為各種社會類別團體 (categories) 的特殊社會結構。社會學家 Peter Blau (1977) 將這些社會類別分為名目類別 (nominal) (如性別、種族、階級) 及連續性的地位 (status) (如長幼尊卑的輩份或收入地位等)。社會學的任務之一，就是分析由不同社會類別所形成的社會分化 (social differentiation) 與不同地位所形成的不平等 (inequality)，對於個人生命機會與整體社會結構變遷的影響。

然而，並非所有的社會類別或地位都具有社會意義；只有當某種差別或排序，被依照特定的價值標準賦予高低不同的評價時 (valuation and evaluation)，才會形成社會學家所感興趣的地位階序 (status rank order)，例如依照聯考成績排序的學校志願。不同社會所強調的地位階序可能有很大的差異，如在玻里尼西亞的早期部落中，人們以頭髮顏色來區分社會地位；但有些地位區分如階級、性別、或種族，幾乎在所有的社會都是形成不平等的主要基礎。這些類別或排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些身分會影響個人取得社會中有價值之資源的能力與機會。這些資源包括經濟性資源，如土地、流動資產等；政治性資源，如工作場所的權威、政治影響力等；文化性資源，如對文學藝術的品味、符合上流社會的言談舉止；社會性資源，如社會關係、社團成員；尊榮性 (honorific) 資源，如聲望、名譽、他人的敬意與順服；知識技能，如專業、學經歷等。階層化 (stratification) 是指一個社會的成員，不平均地分布在與資源取得攸關的不同社會類別或地位上的情形。一個社會的上、下層級的距離越遠、資源差異越大，表示社會的階層化程度越高。一般以社會不平等 (social inequality) 來形容社會中少數人擁有不成比例的財富、權力、及聲望的情形。社會階層化的主要課題，在於描述一個社會中的各種不平等，並解釋為什麼不平等的現象可以持續不斷的存在 (Grusky, 2001)。

美國社會學者 Grusky 將產生及維繫各種社會不平等的一套複雜社會制度統稱為階層化系統 (stratification system)。一個階層化系統包含三個主要的部分：第一、社會中存有一套界定甚麼是「有價值、值得追求」的規

階層化 (stratification)：
一個社會的成員在具有不同資源與機會的社會位置上之分布情形。



社會不平等（蘇國賢／攝）。

範。例如財富、權力、名譽幾乎是所有社會中，人人都想追求的報酬；但知識學問在不同社會中受到的重視程度不一，在「萬般皆下品」的古代中國社會中，追求「學位」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在歐洲中古黑暗時期，追求知識僅為極少數人有興趣的活動，而非人人都想要的「獎品」。第二、社會中有一套分配規則，將不同的「獎品」、「報酬」分配至社會分工中的各種不同的位置（positions）上，即決定哪些位置薪水較高、權力較大等。例如醫生的職位，其收入待遇與受人尊敬的程度皆高於一般職位；在封建社會中，貴族地位比平民享有更多的財富與權力。第三、社會中有某種流動篩選機制（mobility mechanism），將社會成員分派到擁有不同報酬的位置上。例如在古老印度的種姓制度（caste system）之下，社會按照出身來分派身分地位；資本主義社會則透過市場機制，按照個人與職位的條件，將有工作意願的人安排到各種不同的職位中；而社會主義國家則透過國家的集體分發，將工作職位與人才進行配對。社會不平等即是在「報酬—位置」與「人—位置」兩個配對過程（matching process）中產生的。Grusky認為階層化研究至少包含以下核心議題：（1）人類社會一定有不平等嗎？不平等的主要形式為何？（2）現代社會中劃分階層最主要的界線是甚麼？這些界線在現代社會中是越來越明顯還是越來越模糊？（3）這些界線是否容易被跨越？哪些因素會影響個人在社會位置上的流動過程？（4）我們的生活型態、行為態度、生命機會如何受到我們所處的社會位置的影響？（5）社會階層化與不平等會改變嗎？

貳、社會一定會有不平等嗎？ 衝突論與功能論的觀點

（一）階層化理論的古典傳承

馬克思（Karl Marx）與韋伯（Max Weber）是對階層化理論最有影響力的兩位理論家。對馬克思（Marx and Engels, 1978）來說，人類所從事的經濟生產模式，是了解社會的關鍵。他認為在資本主義中，擁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capitalist），支付給勞工的工資，遠低於其實際生產的價值，而將「剩餘」以資本的形式儲存，並用來產生更多的「價值」，形成階級間的剝削。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階級間的剝削關係因資本的累積而擴大，使得越來越多生活在貧窮邊緣的無產階級，逐漸認知到被剝削的共同命運，階級衝突因而成為不可避免的歷史必然。簡化的來說，馬克思認為歷史就是想要維持現狀的支配階級，與想要奪回自身權益的被剝削階級之間的不斷衝突與鬥爭，直到無產階級執政時，人類將恢復到原始的共產社會，階級鬥爭的歷史才會結束。他認為資本家與工人階級間的剝削與對立，是推動歷史演進的主要動力。近代歷史並沒有如馬克思所預期的，朝向資本家與工人兩大階級對立的方向演進。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出現了一批以經理人、專業人士及行政人員為主的新興中產階級（new middle class）。晚近的馬克思學者對於中產階級的興起持兩種不同的看法，有些學者認為中產階級的興起是短暫的現象，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下遲早會被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ed），逐漸向下流動成為工人階級，成為一股對抗資本家的龐大力量。另外一批學者認為中產階級的持續擴大，並非歷史的過渡現象，這個階級有其特殊的階級地位，他們雖然不擁有生產工具，但可以透過組織的權威（authority）來控制（control）包括機器及人力等生產工具。德國社會學家達倫多夫（Dahrendorf）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將擁有權（ownership）與控制權（control）分離，形成「擁有權威者」與「接受權威者」兩大階級對立的情形，才是當代社會中最重要的矛盾。

韋伯（Weber, 1946）將馬克思的單一經濟觀點拓展成多面向的觀點，

包含經濟面向的階級（class），即一群面對共同生命機會的群體；社會聲望的地位（status），即一個人或團體所受到的社會尊崇（social esteem）程度；與政治面向的權力（power），即支配他人或影響他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來行事的力量。韋伯認為這三個面向共同決定個人或團體在階層化系統中的位置，但不同面向在不同歷史或社會脈絡的重要性不一。例如在工業革命初期，階級位置特別重要；而在印度種姓制度下，個人的地位完全由出身決定。韋伯認為經濟衝突僅為眾多衝突面向的一環，即便經濟不平等減弱，其他不平等的形式可能取而代之。韋伯不如馬克思那麼樂觀，認為階級衝突最終會導致革命，使人類社會趨於平等；他悲觀地認為，不平等所引發的衝突與支配是人類社會的常態。

承襲韋伯觀點的當代階層化學者，以多面向的架構來分析現代社會中的階層化現象。他們發現在大多數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聲望、文化、權力等不同地位面向之間的重疊性並不高，經常出現地位不一致（status inconsistency）的現象，如經濟地位高但職業聲望低的暴發戶、文化地位高但經濟地位低的知識份子等。這些地位不一致有時也會引起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造成主觀上的不公平感受，是形成各種改革訴求及社會運動的主要力量。另一批承襲韋伯思想的社會學家，企圖理解各種地位團體形成的原因，他們分析各種地位團體如何透過招募成員及排除他人的過程（exclusionary processes），來壟斷特殊的報酬與機會，並透過創造共同的生活經驗及可以代代相傳的特殊階級文化，形成具有流動壁壘的封閉性團體（social closure）。

（二）階層化的當代理論

並非所有的社會學家都視社會為不斷衝突的過程。結構功能學派（structural functionalism）認為，不平等是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如在現代社會分工之下，不同職位的報酬差異甚多。他們認為在社會分工體系下，每個分工位置的工作條件不同，有些職位的功能較重要，有些則需要特殊才能、或經長期訓練才能勝任，因此社會提供不同的誘因，才能吸引合適的人才來就任。這種報酬的不平等對社會的正常運作有一定的

「功能」，未必會造成不公義的現象。Davis和Moore（1945）認為一個職位報酬的多寡，決定於該職位的功能重要性（functional importance）及人才技能的稀少性（scarcity of talents）。這與經濟學家的看法一致，勞動市場會根據供需原則自動地將適當的報酬分配於不同職位上，以產生社會分工所需的工作誘因（incentives）。解決了資本主義分工體系的工作動機問題（motivation problems）。

觀點的社會學家對於結構功能的論述提出幾個質疑：（1）誰來界定各種職位對於社會的重要性？衝突論者認為地位越高的人，越有能力根據自己的利益來界定職位的重要性，例如美國大公司的高階主管為自己制定的薪資，經常遠超過該職位的實質貢獻。由於缺乏衡量職位相對重要性的客觀標準，精英階層可以透過支配權力來合理化不平等的現狀。（2）社會提供給每個人的機會並不相等，例如弱勢族群可能受限於教育或就業機會，或因不平等所造成的歧視，限制了他們的發展空間。在機會不平等之下，階層化系統會造成人才無法「適得其所」、「充分發揮」。（3）社會階層系統會使得上、下階層之間因為報酬的差異而產生對立與不信任，弱勢族群會因為不受重視而對社會採取冷漠的態度，有礙社會的整合。

衝突論者認為報酬的分配未必依循個人的貢獻，還有可能是權力支配、階級宰制的結果。例如Charles Tilly（1998）指出剝削（exploitation）及機會阻隔（opportunity hoarding），是造成不平等的兩個重要社會過程。剝削是指某些社會成員努力創造出來的價值，部分或全部被其他成員占有的情形，如佃農的收成，必須部分繳納給地主；工人生產的價值，部分被資本家侵占。機會阻隔是指社會中的某些成員，透過排除過程（process of exclusion）限制其他人的機會，壟斷取得社會資源的管道，例如施行種族隔離的殖民者以限制人民從政、教育、及就業機會，來維持統治上的優勢；社會中的精英階層，在社交和婚配上多與相同地位的成員往來，也造成隱性的社會排除。社會學家認為過度的不平等，會使得支配階級以既有的優勢資源，來維繫不平等的現狀。因此一個社會究竟需要多大程度的不平等，才能產生足夠的誘因，又不致造成階級支配的現象，是社會階層化研究的重要課題。

參、階層化結構的不同面向？

社會中有哪些「階層」？由誰來決定每個人在階層上的位置？任何會造成地位、權力、聲望等不平等的社會差異或分化，都可以構成社會階層化的面向。傳統上，社會學家特別重視性別、種族、階級等三個面向的階層化。社會學家分別從主觀與客觀面來進行分析。客觀的分析從個人的職業、教育程度、收入，及所擁有的社會關係等，將社會分成擁有相似資源或面對相同機會的結構位置（positions），並從這些客觀建構的社會地位來研究階層化問題。這派學者認為，無論個人是否意識到自己所處的客觀位置，這些結構位置對於個人的生命機會與生活型態，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階層化並非僅是客觀的現象，也涉及人們的主觀態度與信仰。從主觀的視角來看，早期的左派社會學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如馬克思預期地在資本主義中發生，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無產階級缺乏清楚的階級認同，因此這派學者特別關心個人是否對於自己所處的地位有清楚的認知，例如以「你覺得自己屬於哪一種階級？」來測量個人的主觀階級意識（subjective

臺灣的階級結構變化

Erikson及Goldthorpe（1992）兩位學者將社會上的職業彙整成很多高低不同的階級（class）：（1）專業階級：包含專業人士、經理人、高階技術人員等。（2）行政階級：辦公室行政及商務人員、業務員等。（3）自營階級：小雇主及一般商家等自營工作人員。（4）務農階級：農、林、漁、牧等從業人員。（5）技術工：技術人員、現場監督、技術勞工等。（6）非技術工：如體力工、機器操作員、工廠作業員等。這些階級構面，除了影響資源與機會的多寡之外，也被社會學家認為是影響子女地位最重要的背景因素之一。表5-1呈現臺灣階級結構的變化。在1928-45年出生的男性中，有29%的人屬於務農階級，到了1966-86年出生的男性中，僅剩下3%屬於此階級。表下半部顯示父親世代的階級，1928-45年出生的男性中，有60%的人父親在務農，到了1966-86年世代，僅有20%的人父親屬於務農階級。

表 5-1

臺灣階級結構的世代變化（N=12,995）

出生世代	男性					女性				
	1928-45	1946-55	1956-65	1966-86	總數	1928-45	1946-55	1956-65	1966-86	總數
樣本數	1,780	2,928	3,438	1,321	9,467	821	1,841	2,494	974	6,130
本人階級										
專業階級	19%	26%	29%	36%	27%	10%	19%	23%	36%	22%
行政階級	5%	7%	7%	9%	7%	11%	18%	27%	34%	24%
自營階級	21%	28%	24%	16%	24%	16%	19%	16%	10%	16%
務農階級	29%	10%	6%	3%	11%	35%	9%	4%	1%	9%
技術工	12%	15%	19%	21%	17%	12%	14%	14%	8%	13%
半技術工	15%	15%	14%	14%	15%	16%	20%	16%	11%	16%
父親階級										
專業階級	10%	14%	13%	15%	13%	8%	13%	15%	17%	14%
行政階級	4%	6%	6%	6%	6%	4%	7%	5%	5%	6%
自營階級	15%	17%	20%	27%	19%	12%	17%	22%	29%	20%
務農階級	60%	47%	38%	21%	42%	66%	46%	35%	20%	40%
技術工	5%	8%	12%	13%	9%	4%	8%	10%	12%	9%
半技術工	7%	9%	12%	18%	11%	6%	9%	12%	16%	11%

資料來源：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1992-2005。整理自Yu & Su, 2008。

class conscience）。主觀階級意識受社會流動的影響甚大，由於工業發展帶來高度的社會流動，同一個階級內的成員不斷地流進、流出，對於未來還會向上流動的期待使得一般人不容易對特定階級產生認同，且同一階級的成員經常來自不同階級背景的家庭，異質性很大，很難形成共同的階級意識，因此社會流動造成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的阻礙。

除了階級認同之外，學者也關心地位的形成及評價的過程（valuation and evaluation）（Sander et. al., 2012; Lamont, 2012）。其中涉及兩個基本的社會過程：分類（Categorization）與正當化（Legitimation）（Lamont, 2012）。社會學家指出，人們經常以簡單的分類架構（schema）來評估他人的社會地位。這種可將人群快速區別、歸類的地位概念，是不同的社會群體在長期的社會互動中，相互界定出來的一種社會建構的社會疆界（socially constructed boundaries）。除了分類之外，對於不同類別的評價，必須透過某種正當化的過程才能建立。所謂「正當化」指的是大家對

於某個事物的價值有共同的認定與信仰。階層研究的主觀分析企圖了解在日常的社會互動中，主觀階級意識及各種社會界線如何被建構、如何被評價，並分析這些界線如何影響社會成員的互動，形成不平等的現象。社會學家認擁有較多經濟、政治、及社會資源的優勢團體，在界定社會界線及其內涵上較具有影響力，因此一個社會對於人群慣用的分類方式經常反映出優勢階級的價值觀。例如IQ測驗以主觀的「智性」能力標準將人加以區別，早期美國白人即透過媒體與大眾文化，將黑人塑造成「IQ較低」的貶抑形象。上層階級也經常灌輸社會大眾對於窮人的負面社會觀感，如懶惰、缺乏向上動機、缺乏紀律教養等，以合理化社會中不平等的現象。



問題與討論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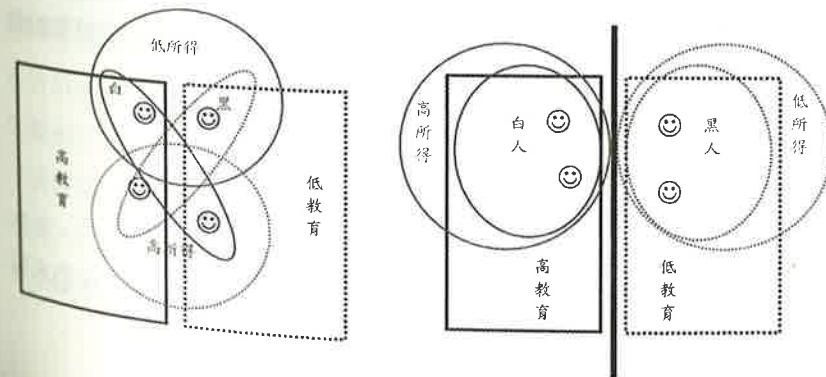
當社會學家用看似科學的方法，透過職業內容來創造階級概念，將社會成員分成上、中、下階級時，不也是在創造區分嗎？這些區分也會產生偏見嗎？究竟是社會成員自己主觀的地位評價比較正確？還是社會學家客觀分析得來的地位區分比較正確？誰的看法比較重要呢？

社會當中是否有明顯的階級界線存在？有些學者傾向認為每一個社會都有某些基本的階級類別疆界，將人群分成相互對立的社會群體；而其他學者則認為諸如階級這類的概念，都是社會學家主觀建構出來的類別，他們認為現代社會中的階層化結構是由很多具有不同收入、聲望等報酬的地位所組成的連續性階梯，其間並沒有清楚明顯的類別界線。為甚麼學者對於用類別還是連續的概念來測量社會階層化會有不同的看法？持衝突論的學者認為社會是由對立的利益衝突團體構成的，既然有對立，一定有清楚的「你—我」界線，形成支配與被支配階級。相反的，主張不平等應該以連續性的方式來測量的學者，將不平等視為具有價值的資源（財富、權力）或特質（才能、知識）在人群中的分布結果。結構功能學派的學者認為資源的不平均分布具有誘因「功能」，連續的報酬階梯可以讓人對未來

充滿期待，比較有提供動機的效果。這些爭論不僅僅是方法上的問題，更反映學者對於社會階層化的基本預設。主張以連續性地位來研究不平等的學者，認為不平等可以化約成重要的單一面向，例如經濟學家主要研究收入不平等（income inequality），認為其他不平等皆與收入高度相關。社會學家則反對這種單一的化約看法，認為具有相同收入水準的人，仍有不同的品味、文化，且彼此之間的互動也不高，很難將之視為同一個地位團體。社會學家認為最能捕捉現代社會多面向不平等綜合測量為「階級」。不同階級成員面對不同的生命機會與條件，包含（1）擁有不同工作相關條件與資歷（endowment）、如正式教育、工作經歷等，（2）面對不同工作條件（working condition），如不同勞動契約、工會、勞動市場、工作權威、自主性等，（3）具有不同報酬，如收入、健康、財富等。

社會學家布勞將這兩種測量方式做了清楚的區分，名目參數（Nominal parameter）如性別、宗教、種族等，將社會分成有清楚界域的團體（groups），而連續參數（graduated parameter），如收入、聲望等，將人按照某種連續性的地位階序（status rank order）來排成高低不同的地位（status）。這些不同的團體與地位形成各種不同的社會位置。社會結構指的是人口在不同社會位置的分布狀況，這種分布不但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相對關係，也影響人們彼此之間的互動。他將人口在名目參數上的分布情形稱之為異質性（heterogeneity），而人口在連續參數上的分布情形稱之為不平等（inequality）。他認為各種參數之間的重疊與交錯為社會結構的最重要面向，對於社會的整合與衝突有很深的影響。例如圖5-1所顯示

圖 5-1



的，當收入與教育程度地位與種族團體界線重疊（consolidating）時，會形成壁壘分明的對立團體（overlapping social circle）；相反的，當收入地位、教育程度、與種族等三個界線交錯（intersecting）時，則會形成跨越疆界的社交團體（cross-cutting social circle），使得不同位置的社會成員彼此互動，社會整合度高、流動性大。

肆、不平等是甚麼因素造成的？ 「分配與機會」「個人與結構」的分析

社會學從「分配」與「機會」兩方面來討論不平等的現象。分配的不平等是指具有價值的資源，如財富、聲望、及權力等在社會中分布不均的情形；機會的不平等指的是個人在社會階梯位置中，上下流動的可能性。這兩種不平等都與「資源」及「人」在社會結構中的分布有關。前者是討論資源在不同「社會位置」的分布，後者則涉及人在「位置」上的分布過程。例如一個社會中有錢人與窮人財富的差異有多大，是分配問題；窮人是否有「翻身」的機會，則是機會的問題，兩者雖然相關，但相關程度隨著時代及社會脈絡而異。

社會學分別從個體（individual）及結構的角度來探討影響分配與機會不平等的因素。個體的分析主要探討出身背景、個人特質或經歷，如何影響個人的生命機會及社會流動過程。例如為何有些人會陷入貧窮？個人透過何種方式可以取得地位？結構的分析認為社會中有「好」、「壞」不同的位置，這些位置會影響個人取得資源的管道（access）、機會（opportunity）、及結果（outcomes）。性別、種族的不平等或是貧窮問題，並非弱勢族群本身條件較差所致，而是因為他們被分派到較差的結構位置所產生的結果。

（一）分配不平等的個體分析：社會底層與貧窮

社會學家分別從個人（individual）因素與結構（structural）因素來探

討形成不平等的原因。個人的解釋觀點，將不平等的成因歸諸於人與人之間在天生屬性、才能、教育、努力、經驗等個人特質或生命歷程上的差異。在個人主義盛行的美國社會，雖然貧富差距十分明顯，但大多數人仍相信每個人都有公平的機會（equality of opportunity）可以改變自己的處境，使得社會普遍認為個人必須對自己的行為結果負責：窮人之所以貧窮，是因為自己不努力，這種「歸咎窮人」（blaming the poor）的態度認為一個人會陷入貧窮困境，是因為諸如懶惰、浪費、缺乏自律等窮人特有的「德性」（moral character）所致；政治上也有很多支持「歸咎窮人」的訴求，認為社會福利制度只會使懶人更懶、窮人更窮。Simmel（1908/1971）指出，這種歸咎窮人的態度一方面可以紓緩大眾對於貧窮「視而不見」的罪惡感，另一方面也透過瞧不起「好吃懶做」的「他人」來增加自己的優越感。

歸咎窮人不僅是大眾的想法，這種個人歸因也存在於科學家的信念中。雖然大多數的社會學家不認為貧窮應該歸咎於個人的責任，但有很多以「個人」為分析單位的研究，會不經意地用諸如缺乏自律及成就動機、忽略教養等個人因素來解釋貧窮。政治上也有很多支持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訴求，認為社會補貼與救濟等福利制度只會使得懶人更懶、窮人更窮。1994年Hernstein和Murray（1994）在*The Bell Curve*一書中以窮人的IQ分數低於平均值的發現，來隱涉窮人天生資質較差（biological inferior）的可能性。後續學者指出並非心智能力較低造成貧窮，而是貧窮的環境，使得母親健康狀況欠佳、孩童營養不良、學校及家庭中缺乏智性上的刺激等環境因素，阻礙了智能的正常發展。貧窮文化理論（Culture of Poverty theory）中，Lewis（1959）認為窮人面對生活的挑戰，因此必須以特殊的生活型態來因應艱困的環境，逐漸發展出一種貧窮次文化，並透過社會化過程將這個次文化傳給下一代，使得在貧窮社區長大的孩童發展出特別適合貧窮社區的人格特質，而缺乏掌握脫離貧窮機會的能力。例如貧民區的孩童被認為較缺乏遞延滿足（delay gratification）的自我控制能力，這種「活在當下、過一天算一天」的態度，雖然有助於適應充滿不確定的貧窮環境，免於對未來過高的期望而產生失落感，但同時也阻礙了窮人利用教育及就業訓練改善自身處境的機會。貧窮的情境理論（the situation view

of poverty) 對窮人文化理論提出嚴厲的批評，認為窮人的行為態度並非造成貧窮的原因，而是反映他們貧窮的處境。例如貧民區女性單親家庭特別多，不表示她們追求此價值，而是因為男性失業率高、犯罪坐牢率高所致。貧窮文化的論述預設窮人必須先改變自己，才能脫離窮困的情境；而情境理論認為只要情境改變，窮人就會有機會改善自己的貧窮處境，不會因為窮人的特質而受到阻礙。

這些理論基本上都從個體層次來探究「窮人在哪些方面與一般人有差別？」本質上仍脫離不了「歸咎窮人」的論述。很多學者因而轉向探究造成貧窮的結構性因素，認為貧窮是陷入較差的結構地位所造成的。例如在就業市場中，有些職位薪資低、訓練機會少、升遷前景差、且替代性高。這些條件較差的位置，形成所謂邊陲勞動市場，與報酬較高、機會較佳的核心勞動市場產生明顯的區隔 (Piore, 1970)；而窮人多在報酬低、機會少的邊陲勞動市場中求生存。由於收入不高，迫使窮人僅能集中居住在貧窮社區中。這些不同面向的不平等彼此之間也互為因果，形成錯綜複雜的循環過程。例如住在貧民區的社會底層窮人，在勞動市場的競爭經常處於劣勢，使得無業人口 (jobless) 比例高於一般社區。經濟的惡劣處境，也間接降低了結婚及建立家庭的誘因，高比例的單親家庭又進一步影響下一代的教育，使其持續陷於經濟底層的惡劣處境。近年來關於社會底層 (social underclass) 及城市貧民窟 (inner city) 的研究都指出，各種不平等面向與社會經濟結構之間的交互作用，形成居住地及勞動市場中的隔離與歧視，才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主要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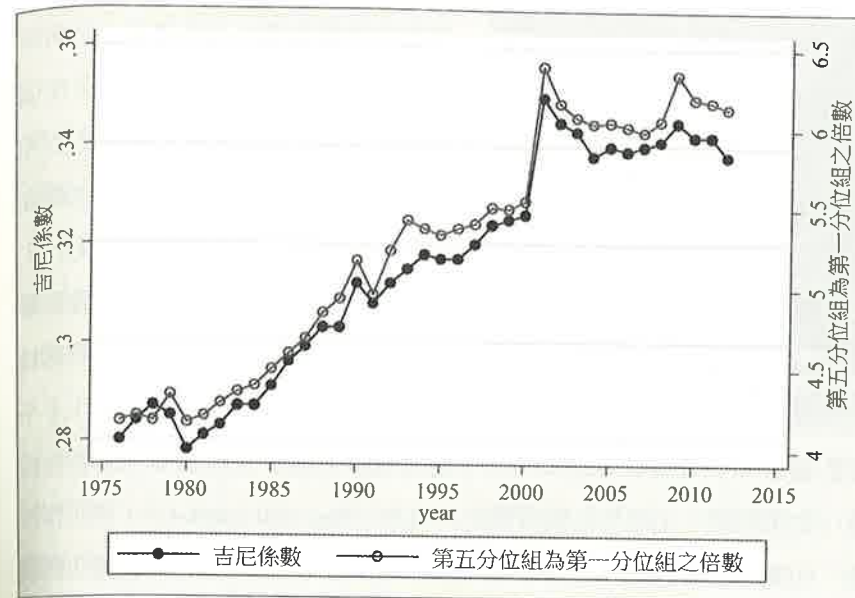
(二) 分配不平等的結構分析：臺灣所得分配的長期趨勢

所得不平等為最普遍的一種分配不平等。圖5-2顯示臺灣所得不平等的長期趨勢。無論是用吉尼係數 (gini coefficient) 或所得倍數來衡量不平等，所得差距從1980年開始攀升，呈現線性成長趨勢。2000年所得差距有明顯的跳升，但其後又拉回至線性趨勢點。

這樣的不平等程度是高還是低？臺灣2006年的吉尼係數在134個國家中排名第41位；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國家不平等的程度高於臺灣，算是在

吉尼係數
(gini coefficient)：
用來衡量一個社會所得
不平等程度的指標，係
數的數值愈大代表所得
差距越大。

圖 5-2
臺灣所得不平等之長期趨勢 (1976-2012)



經濟急速發展過程中控制所得分配十分成功的國家。

影響所得不平等的因素包括：(1) 政府的控制；如土地政策、賦稅措施、與社會福利等所得移轉政策。由於富人的避稅誘因及能力較高，對政策的影響較大，各項租稅措施或經濟政策所產生的實際所得移轉，不一定有助於縮減所得差距。(2) 經濟結構與勞動市場的變化；如進入後工業時代之後，低薪的服務業工作大增，擴大勞動階級內的所得差距。資訊科技的興起，使得獲利較高的科技產業與傳統製造業形成兩種不同的勞動市場，增加了產業「間」的所得差距。近年來企業的縮編與外包、委外風潮，使得僱用關係起了本質上的變化，不少邊陲工作者變成收入不穩定的「彈性人力」，加上產業外移造成失業率提高及部分工時人員的增加，都是近年來所得差距擴大的重要成因之一。(3) 人口與階級結構的變化；如遲婚、不婚、離婚與人口老化，使得單親或單身族群等較容易落入社會底層的人口比例增加。臺灣戰後初期所得差距的下降，可能與「務農」及「非技術」階級「升級」至「技術」及「行政」階級有關；而進入工業經濟之後，儘管階級的組成結構趨於穩定，但所得差距仍持續成長，可能是階級內與階級間所得差距擴大所導致的結果。(4) 勞動



教育與不平等有高度相關（蘇國賢／攝）。

力組成的變化；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勞動人口的老化、教育擴張所帶來的勞動力素質改變、及外籍移工及新移民的增加，都是影響近年所得分配因素。（5）勞工政策與勞資雙方的相對力量：政府對於勞動市場中勞動條件、工作環境、勞動報酬的規範，工會相對於資方的議價能力等都會影響經濟產出的分配。（6）資本的累積優勢（cumulative advantage）；不平等的擴大，與各種資本的累積與「再投資」有關。這些資本包含金融投資、企業經營、土地等各種實體財務資本（financial capital），與工作技能、知識等非實體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除此之外，透過人際網絡關係所形成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決定人力資本與財務資本能否發揮功效的重要因子。這些資本的分布並不平均，且可以透過代間移轉（intergeneration transfer）傳給下一代，形成累積的競爭優勢，在市場競爭中產生「富者越富」的馬太效應（Mathew Effect），加速所得的不平等。



問題與討論 5-2

教育體制的變化對於所得分配有重要的影響。臺灣戰後經歷義務教育的延長、技職體系的擴張、及90年代後期的高等教育的快速成長等三個發展階段，對於所得差距造成哪些影響？

伍、不平等的結構會改變嗎？ 社會流動與不平等的再製

分配不平等，是檢視同一時間點內，社會結構中資源分布不均的情形。而機會不平等，則是探討各階層是否有公平的機會在社會階梯中向上流動。如果社會的分配過度不均，使得每個人向上流動的機會隨著其擁有的資源多寡而迥異，形成優勢階級比較容易維持其優勢地位，而劣勢階級永遠居於社會底層的不流動情形，則不平等的結構可能會被「再製」（reproduction）。

所謂「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是指一個人在不平等階梯上，上下移動的情形。一般又分成代間流動（inter-generation mobility）及代內流動（intra-generation mobility）。代間流動指的是不同世代之間，階級地位的變化；代內流動指的是不同時間點，個人社會位置的變化。一個社會的流動性（social fluidity）越高，代表社會的機會結構越開放。相反的，如果每個人的社會地位，大部分都是與生俱來的，很難透過後天的努力而改變，則我們說這個社會是一個階級界線十分嚴峻（rigid）的社會。社會流動可以從個人與結構兩個層次來進行分析：地位取得研究（status attainment research）從個人的觀點來分析影響個人地位變化的因素；階級流動（class mobility）則從結構的觀點來探討兩個世代之間階級結構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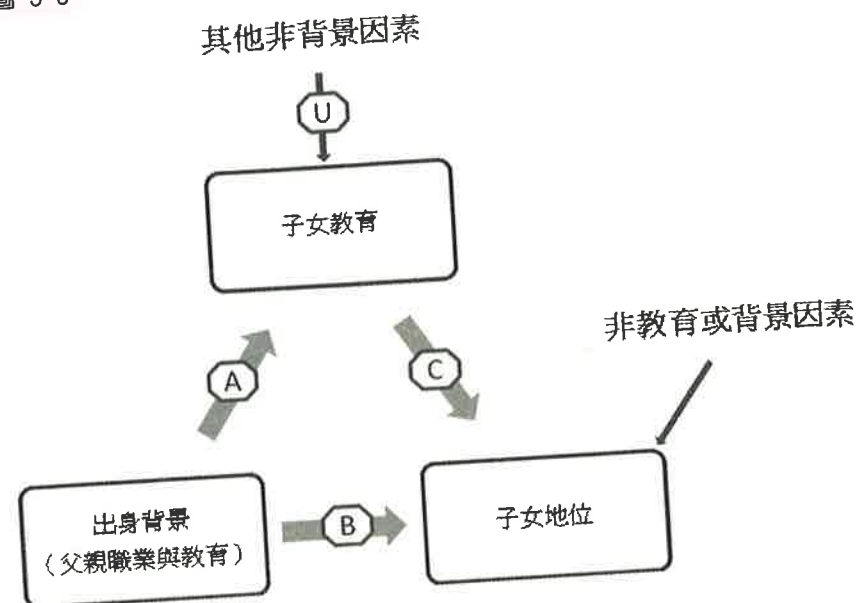
再製（reproduction）：
支配階級以其優勢資源來重製可以維持其支配地位的社會結構之過程。

（一）機會不平等的個體分析：地位取得研究

Blau及Duncan（1967）指出，在現代社會中，教育同時為影響向上流動及地位再製（reproduction of status）的重要因子。學校可以增加向上流動的機會，因為其他非背景因素對教育及個人成就的影響（從U到C的影響，如教育擴張增加了女性的就學機會，進而增加其向上流動的機會），可能超過家庭背景（如父親的職業與教育程度）透過教育來影響子女地位成就的力量（從A到C的影響）（見圖5-3）。

學校同時也有助於再製地位，原因在於現代社會中，出身背景透過

圖 5-3



教育來間接影響地位成就（由A到C的影響路徑）的力量，已經漸漸超過出身背景對於一個人事業成就的直接影響（B）。例如醫生的子女雖然無法透過繼承的方式來取得醫生的地位，但可以透過較佳的家庭教養及父母親所提供的教育機會，來增加其考取醫學院的機率。Bowles與Ginitis（1976）認為，學校的考試篩選，基本上反映了中、上階層的文化，致使不熟悉中產階級文化的學童較不易在學校有好的表現。因此學校教育不但再製（reproduce）了一個社會的階級結構，還讓這種不公平的機會結構表面上看似公平（Hout and Diprete, 2006）。



學校與社區對階級流動有高度影響（蘇國賢／攝）。

除了提供具體資源之外，家庭與學校也透過影響子女對未來的期待來影響其向上流動的機會。理性選擇的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指出，每一個人在面臨重大教育選擇時（繼續升學還是升學？就讀甚麼學校科系？），都會根據教育的期望效益與成本、及成功機率來進行估算。而

家庭、學校與社區環境對於這些成本效益及機率的計算有很大的影響，例如家庭是否健全、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教育程度、文化資本、人際網絡、家庭中兄弟姐妹間的競爭與互助、對於子女的教育成就與期望都有直接的影響、學校的資源、老師的期望、社區中其他家庭的狀況等，都在社會化過程中，影響學生的成就與教育選擇。

（二）機會不平等的結構分析：階級流動

地位取得研究企圖釐清個人的出身背景因素如何透過家庭與學校教育來影響子女的社會經濟地位。不過這種以個人為分析單位的模型，被其他社會學者批評忽略了個人在社會中流動時，所必須面對的社會結構機會與局限。階級流動（class mobility）從宏觀結構的角度來探討家庭出身背景與流動機會的關係。階級流動主要關注的問題是：階級出身，是否影響一個人的生命機會？一個社會的流動機會是否會隨著經濟發展逐漸趨於開放？社會學家以代間流動的分析，來回答這個問題。「窮爸爸」或「富爸爸」究竟對於個人的地位有多大的影響？這種兩代之間階級地位上的關聯，是否有世代的變化？例如醫生世家的子弟，是否比農家子弟更有機會成為醫生？階級流動的分析認為一個人會不會成為醫生，除了與家世背景有關之外，還與不同世代當中，醫生這個「位置」的絕對數量變化有關。隨著醫療的普及，對於醫生的需求大幅增加，個人成為醫生的機率當然隨之增加。社會學家將這種因為職業結構改變，造成兩代之間階級地位發生變化的情形，稱為「絕對流動」（absolute mobility）。然而，整個社會對醫生的需求增加，不代表每個人成為醫生的機會都相同地增加。舉例來說，假設醫生的人數在過去50年間成長了一百倍，又假設在50年前，醫生的子女成為醫生的機率，是農家子弟成為醫生機率的十倍，則相對流動分析所關心的問題是，在醫生人數大幅成長的同時，因為家庭背景不同所產生的機會差異，是否發生變化？如果現在農家子弟成為醫生的機率仍然為醫生世家的十分之一，儘管農家子弟成為醫生的機率，因為對醫生需求增加而有大幅成長，但相對於醫生世家的流動機率仍然沒有改變。因此必須將產業升級或教育擴張等結構性變化所造成的絕對流動納入考量之後，

再比較每個階級的相對流動機率，才能看出一個社會的機會結構是否有本質性的變化。社會學家將不同階級背景對於個人相對流動機會所造成的「淨」影響稱之為相對流動（relative mobil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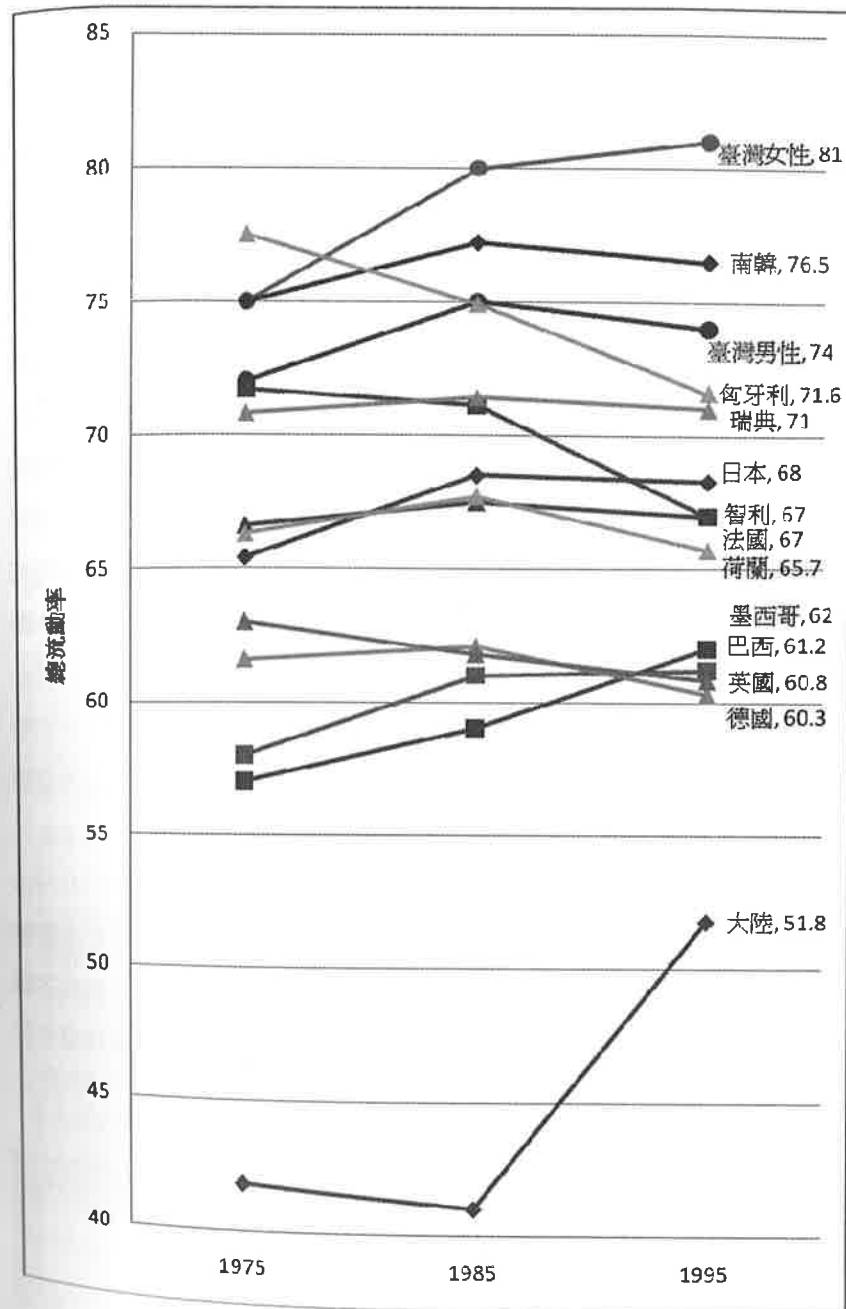
社會流動究竟是越來越開放，還是越來越困難？早期的「自由派的工業化理論」（liberal theory of industrialism）或「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hypothesis）認為，隨著工業的發展，個人的社會中的地位將越發取決於教育及個人努力而非家世背景。這派理論樂觀地認為工業化會使得社會結構趨於「開放」，削弱家世背景對於個人成就的影響。反之，承襲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者則認為工業化不但不會帶來「惟才適用、論功行賞」的功績主義（meritocracy），反而會因為生產自動化，造成勞動者的「降級」（degradation of labor）及「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 of work-force）的現象。因此，工業化會使得勞資雙方的相對力量越來越懸殊，階級壁壘越來越深，向上流動越來越困難，社會因而越來越趨於封閉。

臺灣的階級流動

臺灣的階級流動模式，與歐美社會及鄰近的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是否有顯著跨社會的差別？在經濟發展與教育擴張的急速變化之下，臺灣社會的機會結構是否有越來越趨於開放的趨勢？我們可以用一個社會的總流動率來進行簡單的比較。

「總流動率」指的是一個社會中，與父親階級不同的人所占的比例。圖5-4顯示幾個重要參考國家的總流動率的變化情形。由該圖可以看出，臺灣的總流動率，特別是女性的社會流動，高過於多數經濟發展程度相當的工業化國家，是一個充滿動能的社會。臺灣在進入後工業社會之後，其階級結構及社會流動機制已經趨於成熟與穩定，社會流動模式與多數的成熟資本主義國家十分類似。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高速成長的中國大陸之外，無論是工業化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總流動率在同一個社會中的變化皆不大，顯示各個社會的流動性呈現穩定的狀態。臺灣女性的總流動率在各世代中皆高於男性，顯示教育擴張及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對於女性的社會流動率有很大的助益。

圖 5-4
各國的總流動率



當代研究歐美社會流動的學者，提出了共同社會流動性（common social fluidity）的假說（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認為一個社會的社會流動率與其內部分工結構有很大的

關聯，而社會分工結構又受到每一個社會的經濟、技術、人口環境的影響，由於每一個社會處於不同的工業化階段，職業結構變遷速率快慢也不一，因此表面上我們會觀察到不同社會的社會流動率有很大的差異。但如果將這些外在因素的影響加以控制，則他們認為大多數以市場經濟與核心家庭為主的工業社會，可能都有十分接近的內在流動模式（pattern of genotypical mobility）。每個社會都受到三種社會流動力量的影響：（1）階級繼承（inheritance）：即留在原階級的機率高於流動至其他階級的機率，如小雇主可以透過資本及財富的移轉，農人可以透過土地的繼承，讓子女留在原來的社會階級地位。（2）跨級流動障礙（hierarchy）：流動到鄰近階級的機率高於跨越層級的流動。例如無論哪一個社會中，農家子弟要成為勞工階級的可能性較高，但要向上流動至專業階級則比較困難；而專業階級子女向下流動至農工階級的機也不大。（3）產業區隔（sector）：從農業流動至非農業階級的阻力，因為農業技術不易移轉成都市工作有用的技能，工作機會資訊欠缺、及缺乏都市人脈等社會資本所產生的額外阻礙。他們認為現代社會中的權力與資源的分配已經深植於社會結構，因此各階級的相對機會很難在短期之內被動搖，且一個社會的階層化結構具有自我維繫及再製的內在力量，因此社會流動模式不容易在短時期內發生重大改變。

Richard Breen (2004) 等一群歐洲學者，在2004年發表 *Social Mobility in Europe* 一書，分析了1970-2000年間，11個歐洲國家中的社會流動變化。他們的結果與 *The Constant Flux* 一書的結論並非完全一致，發現各國的流動性在這30年間有很大的變化，且歐洲很多國家的代間階級相關性似乎有下降的趨勢 (Breen, 2004)。



問題與討論 5-3

一個社會的不平等程度與向上流動的機會是否有關？越不平等的社會，向上流動必然會越困難嗎？

過去二十年來，臺灣的代間階級流動究竟愈來愈趨於開放，還是愈來愈困難？蘇國賢與喻維欣的利用社會變遷基本調查1990至2012年的資料來分析過去二十年的階級流動（見表5-2），他們指出臺灣的階級流動主要還受結構流動的影響，總流動率在過去20年雖然持續上升，但上升的速度已經趨緩。且垂直流動率，無論是向上或向下流動率，都沒有明顯的變化。相對流動的分析顯示，各時期的流動模式沒有顯著的差異；女性的社會流動性雖然持續朝向更開放的路徑發展，但開放的程度也已經趨緩。男性各階級間的相對流動機會已經趨於穩定，過去二十年並沒有顯著的變化。這些數據顯示，臺灣階級流動的機會結構已經趨於成熟與穩定，不易受短期環境與制度波動的影響，近來有關機會不平等擴大及向下流動的相關論述，並未得到實證證據的支持。

表 5-2

臺灣階級結構與階級流動近20年的變化 (N=30,922)

調查年	男性					女性				
	1990-94	1995-99	2000-05	2006-12	總數	1990-94	1995-99	2000-05	2006-12	總數
樣本數	6,061	6,917	3,594	1,958	18,530	3,565	4,586	2,576	1,665	12,392
本人階級										
專業階級	25.4	24.3	30.1	30.9	26.5	22.6	19.9	25.4	22.8	22.2
行政階級	8.1	8.7	9.0	8.4	8.5	21.2	28.8	31.0	33.4	27.7
自營階級	21.8	23.9	19.7	20.2	22.0	16.2	14.7	11.2	14.8	14.4
務農階級	15.9	11.7	6.2	5.4	11.4	11.7	8.0	5.0	3.9	7.9
技術工	17.1	16.1	16.9	17.9	16.8	17.4	12.5	9.6	7.5	12.6
非技術工	11.6	15.3	18.1	17.3	14.9	11.0	16.1	17.8	17.7	15.2
總流動率	0.69	0.72	0.75	0.75	0.717	0.74	0.77	0.79	0.80	0.770
垂直流動率	0.54	0.55	0.57	0.57	0.550	0.55	0.54	0.53	0.53	0.539
向上流動率	0.43	0.43	0.46	0.43	0.436	0.44	0.40	0.41	0.39	0.411
向下流動率	0.10	0.12	0.12	0.14	0.114	0.12	0.14	0.12	0.14	0.128

資料來源：臺灣社會基本調查1990-2012。整理自蘇國賢、喻維欣，2013。

(三) 社會流動的規範與不平等的意識形態

每一個社會對於社會流動應依循何種規則，都有一種不成文的規範。

這個規範包含了社會應如何去評核 (testing)、篩選 (selecting)、及分配 (distributing) 成員於不同位置上的規則。Turner (1960) 勾勒出兩種社會流動規範的理想型：在依循競賽流動 (contest mobility) 規範的社會中，社會盡可能地保障每個人都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機會，個人需憑自己的努力，透過一連串的公開競賽來「贏得」社會地位。反之，在薦舉流動 (sponsored mobility) 的規範之下，欲向上流動成為「精英」，必先取得精英階級的「推薦」，然後精英成員根據候選人是否具備成為精英的特質來「遴選」。這些「精英特質」是由上層階級成員彼此互相認可，且需經過特殊長期的養成訓練才能辨識的特質，如特殊品味、生活形態、思維模式、文學藝術素養等文化資本。這種類似「會員認證」的制度，阻斷了一般人進入精英階層的管道，使其可以穩固地再製其會員。

表面看來，競賽流動似乎比薦舉流動更符合公平原則，但這個表面看似公平的規則是否能真正達到機會的平等，有賴於一個社會的教育體制是否能有效地消弭因為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所造成的立足點不平等。法國的社會學家Bourdieu (1977) 指出，社會經濟背景較高的孩童，在家庭社會化過程中習得的文化經驗，讓他們在學校的適應力及學習能力都較強，形成具有競爭優勢的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這些文化資本不平均地分布在各階級中，且代代相傳，是造成學習成效差異的主因。因此學校的體制不但無法消弭初始條件的不平等，反而更加強化原有的社會結構，是不平等得以維繫的重要原因。

不平等的結構必須具有某種「正當性」才能得到多數社會成員的認同。一個不平等的社會如何能確保地位競賽中的「輸家」與精英選拔中的「落選者」，能安於不平等的現狀而不會起來反抗少數的「贏家」？衝突學派的學者指出支配階級不僅是以經濟權力與政治壓制來達成階級剝削的目的，更進一步透過語言符號與教育的控制，強制他人接受符合其階級利益的意識型態 (ideology) 或世界觀，以合理化不平等的現狀。在競賽流動規範之下，個人在教育過程中不斷被灌輸力求上進、追求成功的價值。透過大眾媒體對於「向上流動」之成功典範的塑造與宣傳，使每個人對未來充滿了憧憬。由於每個人皆被鼓勵在體制內去爭取地位，在競賽過程中自然培養出對於現存體制的認可，而不會輕易挑戰競賽規範的正當性。同

樣地，依循薦舉流動規範的社會，通常很早就透過各種測驗與選拔，選出「值得培養」(promising) 的精英。一方面可有較充裕的時間訓練入選者取得不容易被模仿的精英特質；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早對「落選者」進行「再教育」，教導其接受資質較差或努力不足的自我認知，並同時灌輸失敗應歸咎於個人不努力的觀念，以避免日後因為過高的期待或挫折而產生不滿。因此學校不但不能消弭不平等，反而經常成為強化社會差異、維繫社會階層化的推手 (Turner, 1960)。



問題與討論 5-4

每個社會的教育體制也可以用兩種流動規範來理解。有些社會的教育制度很早就進行「分組」或「分流」(tracking)，有些社會則延後篩選的過程，不刻意在學生間做任何區分，儘量讓大家接受一般性的教育而不要太早區分贏家與輸家。你覺得臺灣的升學制度比較接近哪一種規範呢？哪一種規範比較好呢？

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
文化資本是個人由從其家庭階級背景中所習得的語言、文化能力、思維模式與氣質。

陸、結論：階層化的新興議題與臺灣本土研究

階層化的研究雖然是社會學中較為傳統的領域，但新的議題不斷挑戰舊有的理論。與本土研究比較相關的新興議題包括：(1) 層級內的分化與不平等：過去的階層研究強調層級或類別間的不平等，近來學者開始強調層級內的差異。如所得差距擴大，究竟是因為不同所得組或階級間的差距擴大所致，還是同一階級內的差距擴大所致 (蔡明璋，2000)？高等教育擴張的研究指出，教育的競爭已經轉移至同樣為高等學歷內的學校排名地位競爭 (蔡淑鈴，2004；駱明慶，2002)。蘇國賢、喻維欣、林宗宏等學依據傳統大階級 (big class) 的分類所進行的流動表分析，臺灣的階級結構與流動模式在過去20年來已經趨於穩定，且與歐美後工業國

家沒有很大差異 (Yu and Su, 2008 / 2013; 林宗宏, 2009)。但這種大類別的階級分析，無法勾勒更多發生在大階級內的微階級 (micro-class) 之間的繼承與流動後續的階級流動研究應以更細緻類別來區分階級，並在資料蒐集上，擴大測量僱用關係的本質、雇用身分、勞動條件、管理權威、企業組織屬性等過去忽略的職業面向。(2) 不平等的因果機制：過去研究對於影響不平等的因果機制仍有很多待釐清的問題。例如學歷對於地位取得的影響，究竟是因為增加了人力資本、社會資本，還是因為學歷被視為能力的訊號 (signal)？還是教育根本與能力養成無關，完全是因為條件較好的學生自我選擇進入好學校所導致的效果 (selection effect) (Ishida, Spilerman and Su, 1997; Liu and Sakamoto, 2002)。學校及社區鄰里環境，對於成就的影響也是階層化研究的重要議題，不過這方面的研究都有一個自我選擇的問題，即某個學區或社區的孩童學業成就特別高，究竟是因為「好」學校的老師教學較認真，學校設備較好，還是因為比較關心子女教育或資源較多的家庭集中到某些「明星」學區來就讀所導致的結果？研究不平等的學者發現，很多表面上看起來是環境的影響，其實是如何用科學的方法釐清這些環境脈絡 (contextual effects) 的因果機制，是目前階層化研究最重要的課題之一。(3) 社會網絡與階層化：社會成員依照彼此之地位進行選擇性的社會互動，是形成社會排除與機會阻隔的最重要原因。因此研究人際互動所形成的社會資本，也是目前階層化的重要課題 (Hsung and Lin, 2008; Lin, 2001)。(4) 重新檢視家庭的影響：家庭是華人社會最重要的制度，教養方式、對於子女教育資源的分配、及手足結構對於子女的成就有一定的影響 (Chu, Xie and Yu, 2007; Yu and Su, 2006)。過去的研究指出，家庭背景對於孩童教育的影響，在初期教育階段的影響大於後期教育階段。隨著教育的普及與高等教育的擴張，越來越多人有機會進入大學就讀，是否表示家庭對於教育的影響會因而減小？(5) 市場階層化與企業精英階級：在市場經濟為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源的創造、累積與分配，大多透過商業組織與市場競爭來進行。支配階級可以透過對於組織與市場的控制，影響組織報酬及市場利潤的分配方式，例如大型企業透過相互投資，交叉持股，企業合併與合作，形成具有相同利益的企業精英階級 (corporate class)，並透過競選捐款、成立遊說

組織、甚至直接參與政府來影響市場的運作與發展，成為當代最有力量的優勢階級 (王振寰, 1996; 陳東升, 1995)。這些都是臺灣社會目前所面臨的重要不平等課題。

參考書目

- 王振寰 (1996)。《誰統治臺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臺北：巨流。
- 林宗弘 (2009)。〈臺灣的後工業化：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1992-2007〉。《臺灣社會學刊》，第43期，頁93-158。
- 陳東升 (1995)。《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臺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臺北：巨流圖書。
- 蔡明璋 (2000)。〈臺灣的工業化與均等：鉅視過程觀點的檢討與再分析〉，《臺灣社會學刊》，第23期，頁263-299。
- 蔡淑鈴 (2004)。〈高等教育的擴展對教育機會分配的影響〉，《臺灣社會學研究》，第7期，頁47-88。
- 蔡瑞明 (1999)。〈臺灣、美國與日本社會流動的結構分析〉，《臺灣社會學刊》，第22期，頁83-125。
- 駱明慶 (2002)。〈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第30期，頁113-147。
- 蘇國賢、喻維欣 (2013)。〈臺灣階級流動的瓶頸？再論後工業時代臺灣階級流動的變遷〉。發表於「臺灣社會學年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 Blau, Peter M. (1977).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A Primitiv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Blau, Peter M., and Otis D.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 Bourdieu, Pierre (1977).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edited by J. Karabel and A. H. Halsey, 56-6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1976).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 Chu, C. Y. Cyrus, Yu Xie, and Ruoh-Rong Yu (2007). "Effects of Sibship Structure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Intra-Family Resource Transfer in Taiwa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0: 91-113.

- Davis, Kingsley, and Wilbert E. Moore (1945).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 242-249.
- Erikson, Robert, and John H. Goldthorpe (1992).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Featherman, David L., and Robert Hauser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rusky, David B. (2001).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Gender*, edited by David B. Grusky. Boulder, 1-54.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Herrnstein, Richard, and Charles Murray (1994).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 Hout, Michael, and Thomas A. DiPrete (2006). "What We Have Learned: Re28's Contributions to Knowledge About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24: 1-20.
- Hsung, Ray-May, and Nan Lin (Eds.) (2008). *Contexts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in Communities, Markets and Organ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Ishida, Hiroshi, Seymour Spilerman, and Kuo-Hsien Su (1997). "Educational Credentials and Promotion Chances in Japanese and American Organiz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866-882.
- Lewis, Oscar (1959).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Lin, Na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u, Cheng, and Arthur Sakamoto (2002). "The Role of Schooling in Taiwan's Labor Market: Human Capital, Screening, or Credentialism?"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9: 1-56.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78) *The Marx-Engels Reader*. New York: W. W. Norton.
- Piore, Michael J. (1970) "The Dual Labor Market: Theory and Implications." In *The State and the Poor*, edited by Samuel H. Beer and Richard E. Barringer, 55-59.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Publishers.
- Simmel, George (1908/1971). "The Poor." in *George Simmel*, edited by D. Levin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98). *Durable Inequ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urner, Ralph H. (1960). "Sponsored and Contest Mobility and the School 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855-866.
- Weber, Max (1946). "Class, Status, Party."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 Yu, Wei-hsin, and Kuo-Hsien Su (2006). "Gender, Sibship Structure,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Taiwan: Son Preference Revisite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8: 1057-1068.
- Yu, Wei-hsin, and Kuo-hsien Su (2008).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aiwan: The Case of Rapid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y."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Late-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edited by Hiroshi Ishida. Japan, Sendai: The 2005 SSM Research Committee.
- Lamont, Michele (2012). "Toward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Valuation and Evalu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0: 201-221.